

琮瓶的變遷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眾所周知，將中國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主要用玉石製成的呈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考定為禮書所記載的「琮」，其實是清末吳大澂著《古玉圖考》以降的說法。而所謂的「琮瓶」則是指造型模倣自玉石琮，但卻封底，可以做為瓶罐使用的器物。

本文的目的是試圖將琮瓶置於文化史的脈絡中進行考察。結論認為：一、由近代學者命名的所謂琮瓶是宋代出現的新瓶式，由於其集中出現於四川地區窖藏遺跡，推測或與當地的祭儀活動有關。二、明代後期是琮瓶的另一流行時段，當時稱為「著草瓶」，其既是文人書齋的清玩雅器，同時具備知天命或祈求長命富貴的象徵意涵。三、入清以後，琮瓶仍然流行，其造型和裝飾屢有創新，但已從晚明插花或插置著草的廣義花器，趨向單純的擺飾。其次，本文另依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針對傳世幾件景德鎮官窯琮瓶的正確名稱或具體的燒造年代進行了考察。四、日本自室町時代十六世紀以來，即以琮瓶做為茶花道的花器，被賦予「經筒」的名稱，由於其又被載入《萬寶全書》等日用百科書，因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插花器；十九世紀的薩摩燒甚至燒造紋樣繁縟的釉上彩繪描金琮瓶外銷到歐洲。

關鍵詞：琮、琮瓶、著草瓶、簠、程氏墨苑、三禮圖

一、前 言

明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牋》〈論官哥窯器〉條說「小方著草瓶」是官窯和哥窯器的上品，而「大著草瓶」只能忝列兩窯器的中乘品。參酌同書〈瓶花之宜〉條：「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膽瓶、紙槌瓶、鵝頸瓶、花觚，高低二種八卦方瓶……青東磁小著草瓶」；以及「龍泉著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几上，與堂相宜」，¹可知尺寸小的著草瓶因適合書齋插花、文人清玩，所以品格要比陳設於廳堂兩側的大型著草瓶更勝一籌。明末文人似乎頗鍾愛官、哥、龍泉等施罩青瓷釉的著草瓶，認為它是一種雅緻的花器，可入清供，也因此同時代的袁宏道《瓶史》和張謙德《瓶花譜》也建議時人以「龍泉著草大方瓶」或「小著草瓶」來插花。²

最能說明明代晚期文人好尚「著草瓶」的例子，或許可以以明萬曆十六年（1588）刊行的《方氏墨譜》所揭載的一方帶有「著草瓶」自銘的象生形墨錠為代表（圖1）。³在這裡，「著草瓶」完全逸離做為花器的實用功能，已然成為文人雅玩世界中的一種圖像符號。上述案例對於本文來說，還有另一意義，那就是我們可以從「著草瓶」自銘墨錠，得以掌握所謂「著草瓶」瓶式的具體造型。即：是於方柱形的瓶身上方置短直圓口，器身下設寰形足，其整體造型特徵酷似中國新石器時代以迄商周時期，主要以玉石製成的呈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所謂「琮」。至此，我們就可經由現存的實物或圖像資料，相對具體地掌握明代晚期文人對於著草瓶的喜愛風潮。就此而言，備受晚明文人推崇、散見於當時鑑賞筆記的官窯、哥窯或龍泉窯「著草瓶」，顯然即相當於今日學界所俗稱的官窯系和龍泉窯青瓷「琮瓶」。

問題是，宋代官窯系或龍泉窯青瓷「琮瓶」於製作當時，是否也是做為花器來使用？換言之，明人以「著草瓶」為花器一事，到底是承續了宋代以來的原初功能？還是出於心儀宋代古物所做的用途改變？這個問題無可避免地將會涉及到

-
- 1 （明）高濂（趙立勛等校注），《遵生八牋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531-533。
 - 2 （明）袁宏道，《瓶史》，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藝術叢編《觀賞別錄》（臺北：世界書局，1969），頁6；（明）張謙德，《瓶花譜》，同上《觀賞別錄》收，頁2。
 - 3 （明）方于魯，《方氏墨譜》卷三（北京：中國書店，1990），頁41。另外，程君房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刻的《程氏墨苑》亦收錄造型相同的著草瓶墨錠，參見：（明）程大約，《程氏墨苑》（萬曆間程氏滋蘭堂刻彩色套印本），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752。方于魯曾受僱於程君房，關於兩人之間的糾葛可參見：林麗江，〈徽州版畫《環翠堂園景圖》之研究〉，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314。

今日學界將這類呈內圓外方柱狀造型的作品，命名為「琮瓶」或「琮式瓶」、「琮形瓶」的具體內涵及其合理性。因此，以下擬先從「琮」和「琮瓶」談起。

二、宋代的「琮」和「琮瓶」

將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主要用玉石製成的呈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考定為禮書所記載的「琮」，其實是晚近清末光緒十五年（1889）吳大澂著《古玉圖考》以降的說法。⁴就如夏鼐所曾指出：儘管戰國晚期的托古著作《周禮·大宗伯》說：「以玉做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然而漢代儒生已對「琮」的具體形態顯得陌生，似乎只能望文生義的隨意揣測，如漢儒針對《說文》記載：「琮，瑞玉，大八寸，似車軛」，或有注釋以為其造型為鈍角八方，或直角正方者；宋人洪适《隸續》收錄的多方東漢石碑碑陰所見「琮」的圖形，既有做五角或十角形的，也有的是將正中穿孔的八角星形紋視為「琮」。⁵

就現存帶有附圖的禮書所載用來祭地的黃琮之造型看來，如北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在考察禮書經典之後，認為：「琮八方以象地，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從而圖繪出有如八花形鏡的圖形；⁶宋陳祥道《禮書》是以四方的平版為黃琮造型；⁷明代劉績《三禮圖》則是參酌《白虎通》「內圓象陽，外直為陰」的記述，認為琮是中心穿孔的截角八方形板。⁸至於日用類書如《三才圖會》則是以雙重八角星紋為「黃琮」（圖2），⁹後者又和前引洪适《隸續》所收《柳敏碑》碑陰黃琮圖形一致。

另一方面，傳北宋趙九成撰《續考古圖》雖然圖繪一件造型呈內圓外方，即今日所謂「琮」的柱形器（圖3），¹⁰但從趙氏在旁註明「制度未詳」，可知宋代人們所理解的用以祭地的琮，絕非此類內圓外方的粗管形物。至如學問淵博，好

4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原載：《東方學報》40（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9），後收入：同氏《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107。

5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原載：《考古》，1983年5期，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鼐文集》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7-18。

6 （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47。

7 （宋）陳祥道，《禮書》，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五，130冊，頁338。

8 （明）劉績，《三禮圖》，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四，129冊，頁373。

9 （明）王圻等，《三才圖會》器用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中，頁1101。

10 （宋）趙九成，《續考古圖》，收入：《考古圖 續考古圖 考古圖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66，以及同書頁187-190所收，容庚，〈續考古圖述評〉。

古成癖的乾隆皇帝雖亦收藏多件玉製的內圓外方粗管形器，即今日所謂的琮且傳世至今（圖4），但從鐫刻於器上的乾隆御製詩文內容可知，乾隆是將之理解為「擱頭」、「軻頭」或「軻骨」，認為其或屬車飾，或是古人抬舉輦車或樂鼓時套在木輅兩端的飾件，¹¹ 乾隆並於管內裝鑲銅膽，故又將可做為筆筒或花插者，稱為「杠頭筆筒」或「軻頭瓶」。事實上，林已奈夫已曾對近現代學者如何依據文獻記載來探索「琮」的造型特徵之研究歷程，以及學界參酌考古資料漸趨接受清末吳大澂率先將《說文》琮似車軻的記載和今日所認定的琮進行比定之研究史，做了頗得要領的回顧，¹² 而其對於中國古代玉琮的綿密考察更讓本文受益良多。不過，由於林氏的考察重點基本上截止於儒生已不甚瞭解其形制的漢代，因此我想附於驢尾地指出，近年陝西唐惠昭太子陵出土的報告書稱為「玉璜」的正中穿孔之八方形玉板（圖5），¹³ 極有可能即唐代皇室所理解的「八方象地」的「琮」。此一形式的「琮」，不僅可上溯至林已奈夫所指出之洛陽西郊四號戰國中期墓所出穿孔八方石片（圖6）；¹⁴ 其八方的概念甚至可早自四川三星堆或金沙遺址出土口沿呈八角形的玉琮（圖45、47），¹⁵ 並且晚迄明代劉績《三禮圖》都可見到（同圖2）。無論如何，本文以上的舉例，其實只是想說明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唐宋以迄清末，禮學家們心目中所理解的祭地的琮，容或有不同的形制，但絕非今日學界所指稱的呈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因此，設若將宋代以來模倣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古玉琮造型卻又將底封實，可做為瓶來使用的所謂「琮瓶」，視為是《周禮》所定禮神六器之禮地的「琮」，顯然是不合乎實際情況的牽強比例。¹⁶

三、宋代琮瓶的種類和外觀特徵

既然今日學界習稱的琮瓶，也就是說包括《遵生八牋》等明人文集屢次提及

- 11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故宮學術季刊》，6卷2期（1988年冬季），頁17。
- 12 林已奈夫，〈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報》60（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後收入前引《中國古玉の研究》，頁258-260。
- 1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惠昭太子陵發掘簡報》（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6圖5之2。
- 14 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西郊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9（1985年），圖版8之6；林已奈夫，前引《中國古玉の研究》，頁108。
- 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81圖42之1及頁533彩圖1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4期，頁43圖114。
- 16 我本人於〈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

的官、哥、龍泉等各窯「蒼草瓶」在內的瓶式，其實和做為禮器的「琮」無涉，以下姑且先不論其原初功能，或可先就宋元時期琮瓶造型和裝飾特徵，及其出土情況做一初步的觀察。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琮瓶是宋代出現的新瓶式，以質地區分，至少包括銅、石和陶瓷等不同素材，銅琮瓶和石琮瓶目前只見於四川省窖藏出土品，瓷琮瓶除了窯址標本之外，考古出土實例不多，但傳世遺物數量卻不少，南宋時期作品主要來自浙江省青瓷窯系所燒製。綜合各不同質材琮瓶的外觀特徵，可大致將之區分為以下三型。

I型。是於長方柱體上方置筒狀直口，上有平頂蓋，通高9.1公分（圖7）。三節式器身，各節內飾五組渦漩式重圈紋，目前只出土於四川省江油縣窖藏。應予一提的是，同窖藏還伴出有銅鼎、爵等倣古的禮器。報告書依據伴出的銅錢均屬北宋徽宗時所鑄造，推測窖藏文物屬北宋晚期。¹⁷

II型。外形倣自新石器時代多節式玉琮，所見有銅、石、青瓷三種材質。銅琮瓶曾見於四川省廣安縣和彭州市等兩處窖藏，前者通高29公分，口徑8.6，底徑10，平底（a式）。器身紋飾「似獸面紋」（圖8），¹⁸ 後者器身下置上寬下窄的圈足（b式），模製成形，四邊角兩側有由一短一長所框成的「節」，由上至下計八節，各節內以幾何形陽紋為地，各邊角之間的器身即「直槽」飾翻卷式雙鉤花葉（圖9），¹⁹ 而這種直槽內飾紋的例子還見於同省遂寧窖藏出土之六節式帶足（b式）青石琮瓶上的波浪形陰紋（圖10），至於遂寧窖藏的年代，報告書是依據《宋史·地理志》載：「遂寧府……端平三年兵亂」，主張窖藏器物是於端平三年（1236）兵災時所埋入。²⁰ 應予留意的是，上述三處窖藏出土的II型銅和石琮瓶均是兩件成對的出現，看來應是有意為之的組合方式，其中廣安縣窖藏銅琮瓶的外表還髹以漆。另外，遂寧窖藏除出土兩件六節式青石琮瓶之外，還伴出兩件龍泉窯青瓷八節式琮瓶。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151就犯下這樣的錯誤，謹在此訂正，並向讀者致歉。

17 江油縣文物保護管理所（黃石林），〈四川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頁53圖1之12。

18 李明高，〈廣安縣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1期，頁67圖7。另外，原報告書認為該銅琮瓶是倣自西周玉琮（頁68），應予訂正。

19 作品現藏中國四川省彭州市博物館。在此要感謝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張維珊同學的教示並惠賜照片。

20 遂寧市博物館等（莊文彬），〈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頁27。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南宋時期II式琮瓶以龍泉窯的製品佔絕大多數，可確認的作品均帶圈足（b式）。器體外觀大同小異，係以四片模製長方板接成長方柱，柱身上方置寰形直口，柱身下以陶板封實，底置圈足（圖11）。個別作品底心鑄穿小圓孔。²¹此外，從1930年代米內山庸夫於杭州南郊烏龜山山麓郊壇官窯窯址所採集到的器身邊角「節」部殘片（圖12），²²結合1980年代於窯址第2號探方（T₂○B:87）出土的口沿至器肩標本（圖13），²³可以確認南宋郊壇官窯亦曾燒造青瓷琮瓶，並且和龍泉系青瓷琮瓶均屬II型。

III型。可從底足造型區分為平底（a式）和圈足（b式）等兩式。a式見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14）²⁴和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藏品（圖15）。²⁵b式見於大維德基金會（圖16）²⁶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圖17）。²⁷另外，古物市場亦曾出現一件III型琮瓶，²⁸可惜底足造型不明。以上五件III型琮瓶均屬南宋官窯類型，其中a式作品底足無釉，薄施護胎鐵汁，b式除圈足著地處無釉，餘施滿釉，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品另於外底心釉上陰刻「忠厚初」字銘。相對於II型瓷琮瓶內腔方正，III型作品則是以轆轤拉坯的技法製成帶底的中空圓柱，再於柱身對稱貼塑四組模製成形的三角形五節式中空邊角，即以拉坯和貼塑的技法來形構成出內圓外方的琮瓶特徵，極為特殊。應予一提的是，被視為是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所在的杭州老虎洞窯窯址標本當中，即見有此類於圓筒貼塑四邊角的多節式平底青瓷琮瓶（III型b式，圖18）。²⁹

綜合以上三型琮瓶的外觀特徵，可以同意以往學界所認為宋代「琮瓶」是模倣自古代玉石琮的常識性判斷。其中，數量最多的II型琮瓶瓶身邊角雖有六、八

21 Cristie's, *The Imperial Sale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April 2003), p. 218 no. 638.

22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7），頁212，圖220，第3列由上往下數第2件。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6），頁35，圖30之3。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圖14。

25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9, p. 40, fig. 62.

26 同上註，p. 50, fig. 99.

27 林屋晴三等編，《東洋陶磁》1.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2），彩圖13。

28 廖文偉編，《古董拍賣集成·色釉瓷》（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圖1。此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翁宇雯同學的教示，謹誌謝意。

29 秦大樹，〈老虎洞官窯性質芻議〉，《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頁74；以及杜正賢，〈老虎洞窯址——揭開修內司官窯與哥窯瓷的千年面紗〉，《文物天地》，2005年5期，頁49，右下圖。

節等區別，然其原型大致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江蘇吳縣草鞋山或常州武進等地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³⁰ 相對的，邊角中空的III型琮瓶之造型則和商周時期玉琮較為接近。³¹ 但應留意的是，無論是良渚類型多節式長玉琮或是商周時期的矮方形玉琮，均見於四川地區。其次，良渚玉琮各邊角，即「射」部所飾由上而下的大小眼紋，於I型琮瓶上已成了渦卷式重圈紋（同圖7）；而四川彭州市窖藏出土II型銅琮瓶所見幾何形地紋（同圖9），更是業已形骸化的變形，但瓶身直槽的雙鉤陰線刻劃花卷草花葉紋飾，則是入宋以來的創新。

四、琮瓶的形態變遷

考察琮瓶的造型演變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考慮方案和切入點。對於本文來說，與其採取由上而下的編年式考察，倒不如以《方氏墨譜》等所載「蓍草瓶」自銘墨錠為基點，逆向上溯其原型要更為具體而明確，同時有助於順序觀察明代以後此一瓶式的後續變化。

如前所述，刊刻於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所見「蓍草瓶」，是於長方柱形的瓶身上置圓口，下設寰足。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引《埤雅》說蓍草是：「草之多壽者，故字從蓍。《博物志》言，蓍草千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³² 參酌劉禹錫（772-842）《和蘇十郎中閒居時嚴常侍等同過訪詩》之「菱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可知蓍草被賦予的占卜功能。³³ 萬曆二十八年（1600）刊行的《列仙全傳》版畫中收錄的扈謙和司馬季主像亦見琮瓶，³⁴ 前者瓶體光素無紋（圖19），後者瓶身設直槽，邊角兩側有節（圖20），其裝飾特徵與現存明末青花琮瓶大體一致（圖21）。³⁵ 其次，前引版畫所見琮瓶均置於書案上，瓶中插置數枝可能是表示蓍草莖的筋狀長細條。其線條筆直，所以也不排除是用來替代多生長於曲阜孔廟境內占易用蓍草

30 王巍，〈良渚文化玉琮芻議〉，《考古》，1986年11期，頁1009-1016；林巳奈夫，同註12，頁200-206。

31 同註12，頁212-224。

32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5，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79，醫家類，773冊，頁148-149。

33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24，收入：《四庫全書》本，集部，別集類，1077冊，頁475-476。

34 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叢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9、18。

35 Stephen Little, "Shunzhi Ceramics 1644-61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Orantial Art*, vol. 3 no. 2 (1982), p. 25, fig. 27.

的所謂筮竹。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明代的琮瓶以陶瓷製品居多，印證了《遵生八牋》等晚明文集所載以青釉等蓍草瓶插花的時尚，而若對照版畫等圖像資料，可知瓶中既可插花，亦流行插置蓍草或筮竹。此外，從浙江省龍泉市明正德十三年（1518）墓出土的一件龍泉青瓷琮瓶瓶身下部裝飾臺座（圖22），³⁶ 可以推測得知，由於琮瓶器形瘦長，因此有時就另設插座以防傾倒。元代景德鎮窯系燒製的青白瓷琮瓶，也是以模製成形的技法來表現插置於臺座中的琮瓶（圖23）。³⁷ 不過，宋元時期琮瓶仍是以不帶座的瓶身下置圈足的琮瓶較為常見，並以元代江西吉州窯燒製的鐵繪琮瓶最具特色，其中包括於瓶身花瓣形開光內繪飾蓮池鴛鴦，開光外滿飾波濤紋（圖24），³⁸ 而前述四川遂寧窖藏出土的青石琮瓶（同圖10），瓶身直槽部位亦裝飾有陰刻波濤紋。

綜合以陶瓷為主的琮瓶圖像資料，可以認為元明時期琮瓶原型主要是來自南宋時期的II型琮瓶。南宋時期琮瓶雖有銅、石、陶瓷等不同質材，但以龍泉窯青瓷最為常見，而龍泉窯琮瓶的祖型則是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多節式玉琮。其次，四川地區是琮瓶的最主要的消費地，所見銅、石和陶瓷等琮瓶都曾見於當地的窖藏遺跡。雖然良渚文化多節式玉琮之節數及各節兩側所見所謂神面的確實意涵，至今未有定論，不過龍泉窯的陶工幾乎只選擇八節式琮為製作對象，也因此絕大多數琮瓶邊角各有八個由上而下縱向排列的狀似八卦爻畫、一長一短的節，而瓶身四處邊角兩側總計六十四個節，也正和八卦以自迭和互迭而構成的六十四卦有異曲同工之妙。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宋代不乏以八卦紋為飾的鼎爐或碗等器皿，³⁹ 也流行鏡背飾八卦爻畫的所謂八卦紋鏡，後者常見於四川地區，如同省江油縣窖藏即出土帶「水銀陰精，百煉成鏡，八卦象備，衛神永命」銘文的八卦紋銅鏡。⁴⁰ 應予留意的是，宋代I型琮瓶目前只見於四川省江油縣彰明公社窖藏，而II型青石琮瓶和銅琮瓶亦只見於四川省，其中遂寧窖藏的兩件青石琮瓶乃是和一

36 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224。

37 馮先銘，《宋元青白磁》中國陶瓷全集16（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4），圖128。

38 Rose Kerr, "Metalwork and Song Design: A Bronze Vase inscribed in 1173," *Oriental Art*, vol. XXXII (Summer 1986), p. 172, fig. 14.

39 遂寧市博物館等（莊文彬），同註20，頁7，圖4；常德市博物館（徐小林），〈常德黃土山宋墓〉，《湖南考古》，2002下，頁434-447，鼎形爐。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10·工藝美術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圖114，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出土，銀杯。

40 黃石林，〈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2期，頁63，圖1。

對龍泉青瓷琮瓶共伴出土。因此，龍泉窯的陶工們或是接受消費地買主的訂製，或者出於自身意識，而將新石器時代玉琮邊角所飾神面之相當於眉和嘴部位的一長一短的粗橫線條，與八卦的爻畫予以結合。但就宋元時期龍泉窯琮瓶的外觀特徵而言，畢竟只是忠實地模倣、呈現出新石器時代玉琮的顯目外觀特徵罷了。不過，或許由於龍泉窯八節式琮瓶各節長短橫線，和八卦爻畫中的陽爻「—」和陰爻「--」有相近之處，同時「—」有時又代表占筮時一長蓍草，「--」表示兩短蓍草，再加上琮瓶內圓外方的造型，以及段注《說文》「圭」字說，卦字從卜圭聲，且圭形「上圓下方，法天地也」，⁴¹ 因此晚明文人就順理成章地將原本倣自玉琮造型的宋代青瓷琮瓶，比附成所謂的「蓍草瓶」，後來甚至認為瓶身根本是以蓍草為飾，其直槽部位為蓍草的莖，橫者則像其葉。⁴² 傳世的晚明瓷琮瓶瓶身以八卦符號裝飾（圖25），⁴³ 也是在此一理解下所製作出的具有時代特色的產物。另外，《遵生八牋》提到插花宜用「高低二種八卦方瓶…青東磁小蓍草瓶」，則對於高濂而言，琮瓶似乎又可因八卦爻畫裝飾的有無而予以再分類，並給予「八卦方瓶」般特定的名稱。無論如何，從瑞典Kempe Collection收藏的一件福建德化窯白瓷琮瓶，瓶身兩側飾卷草花卉，另兩側則模印大意為：願君壽如廣成子，居於崆峒壹仟壹佰零貳年等內容的銘文（圖26），⁴⁴ 可知用來插置多壽蓍草的琮瓶，同時亦具祈求長命富貴的象徵性功能。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有不少的琮瓶瓶身均施加花草紋飾，雖然其花草種類大多難以辨識，有的甚至只是業已圖案化的卷草。不過，前引浙江正德十三年（1518）墓出土的龍泉青瓷琮瓶（同圖22），瓶身下部臺座部位所飾覆式帶瓣花，兩側伸展出端部呈魚尾狀的半圓形莖，整體形態頗似《本草綱目》所圖繪的蓍草（圖27）。⁴⁵ 應予一提的是，該龍泉青瓷琮瓶雖出土於明代紀年墓，但其胎釉特徵和模印、燒成技法等均酷似韓國新安沈船打撈上岸的龍泉窯四方爐，⁴⁶ 因此有較大可能是元代傳世後才陪葬入壙

41 曹礎基，〈八卦的“祕密”〉，《古代禮制風俗漫談》3（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58-163。

42 郭葆昌等，《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錄》（北京：解齋書社，1931），圖24「宋紫定窯小蓍草瓶」的說明。另據郭氏和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校注本前言稱：原本為項墨林晚年所作，後歸於清怡王府所藏。光緒年間自怡府散出，為英人卜氏獲得後旋毀於火。校注本是據畫師李澄淵臨寫於英人卜氏收藏之前，光緒中葉之後。因此，原本是否確為項墨林所作？參照圖譜所收部分作品的形制、花紋，頗多可疑之處。

43 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912「色繪算木手瓶」。

44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l. 51A.

45 (明)李時珍，同註32，頁66。另參見：(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臺北：世界書局，1974），卷11，頁256。

46 文化公報部，《新安海底遺物》（서울特別市：文化公報部等，1985），頁200，圖51及頁299，圖

的古物。如果以上判斷無誤，那麼於琮瓶施加蒼草之年代就有可能上溯元代十四世紀前半，故明代人所謂蒼草瓶之說，也可能只是承繼舊有的傳承且將之納入其時流行的雅俗觀脈絡中予以評價，而非創新。無論如何，由於明代琮瓶的時代集中於十六至十七世紀，同時又未見任何明代官窯製品，說明了琮瓶流行於明代後期的民間文化圈。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留意晚明文人用以插花或置入蒼草、筮竹的琮瓶，也成為日本花道的時尚道具之一。如大阪商人瓦本道專於日本慶長二年（1597）得自池坊專好的《花傳書》即繪有稱為「キヤウツツ」的五節式琮瓶（圖28），⁴⁷而以「キヤウツツ」即以「經筒」插花之圖像資料，至少還可上溯至傳天文五年（1536）《唯心軒花傳書》（圖29）⁴⁸或淳盛於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所繪製的《立花圖卷》（圖30）。⁴⁹不僅如此，《雅遊漫錄》所見書齋，也是以琮瓶，正確地說，是以明人心目中的「蒼草瓶」來插花（圖31），⁵⁰其與書案上方的碎器筆筒等共同營造出當時人們理想書齋中的一景。畫面所見琮瓶係插置於四足方底臺座當中，琮瓶造型酷似南宋龍泉窯製品。應予一提的是，東京大學本鄉構內江戶城遺跡就出土了南宋至元時期龍泉窯青瓷琮瓶殘件，⁵¹此說明了日本晚至江戶時期（1603-1867），還經常以中國宋元時期古物做為象徵財富或身分地位的格式道具，而琮瓶即為當中的一物。此外，福島縣世原館番匠地遺址也出土了龍泉窯帶座式琮瓶（圖32），⁵²後者之造型和裝飾特徵和前述中國浙江省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墓出土的龍泉窯琮瓶可說一致。

事實上，日本不僅輸入龍泉窯等琮瓶，織部燒之美濃久尻窯場於慶長至元年間（1596-1624），燒造的模倣占易籌木的所謂「算木文」花瓶，⁵³即是原型來自中國琮瓶之創意製作（圖33）。織部燒之外，備前燒亦曾燒造琮瓶，⁵⁴而十七

193。另外，朱伯謙也將類似造型龍泉青瓷琮瓶的年代訂在元代，參見同氏：《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頁191，圖164。

47 德川美術館等編，《花生》（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1982），圖103。

48 細川護貞等，《いけばな》，《別冊太陽》12（東京：平凡社，1975），頁32圖下。

49 山根有三，〈室町時代の立花圖卷について—花道史序説—〉，《大和文筆》14（1954年），頁26-38。另，清楚圖版參見：德川美術館等，同註47，圖102。

50 轉引自：吉田光邦，《工藝と文明》（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5），頁62。

51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遺跡にみる戦國・桃山の茶道具》（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7），圖17，no. 95。

52 福島縣立博物館，《戦國の城——天守閣への道》（福島縣立博物館，1998），圖137。

53 神戸市立博物館，《海のシルクロード》（神戸市立博物館，1982），頁134，圖329。

54 同註35，頁25。

世紀日本桃山時期丹波燒之做為茶道花器使用的所謂「三角花生」，則是業已和樣化的琮瓶（圖34）。⁵⁵ 日本之外，朝鮮王朝（1392-1910）亦曾燒造白釉剔花直筒瓶（圖35），⁵⁶ 從瓶身上之八卦紋飾結合瓶體造型，我推測其原型可能亦來自琮瓶。其次，現藏日本出光美術館之著名越南青花方身圓口雙繫瓶（圖36），⁵⁷ 也可能是琮瓶的變形。後者器身以鈷料繪製狩獵紋，肩部四邊角貼塑獸面，是目前越南青花中僅見的作例，由於又於器身裝飾一道常見於日本茶道具的篋目，故日方學界多主張是日本向越南訂做的茶道具。果真如此，則是日本茶人心懷中國琮瓶瓶式的新設計。

應予一提的是，日方所製作的琮瓶雖多與明式琮瓶，即原型大多來自本文所分類之南宋時期II型長琮瓶較為接近。不過，武者小路千家傳世的一件十六世紀辻與次郎所製作的茶道用鐵釜（圖37），⁵⁸ 則和目前只見於南宋官窯類型的III型琮瓶較為接近。這不由得會讓人想起前述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之底刻「忠厚初」銘文的南宋官窯青瓷III型琮瓶（同圖17）。從裝貯該瓶之內箱蓋裡黏貼簽條與尾張德川家所見形式一致，以及《慶安四年尾張德川家御道具帳》的相關記載可知，該III型琮瓶原是德川義直（1600-1650）（尾張家初代）的收藏，義直歿後，才於慶安四年（1651）讓渡予二代光友（1625-1700），是流傳有緒的名物。⁵⁹ 另從道具帳和貼付於內箱蓋面的「青磁經筒御水指」簽條可知，該琮瓶於當時是被做為茶道席中裝盛洗濯茶碗、茶筴或補給茶釜用水的所謂水指來使用，是日本茶人改變中國道具原本用途的一例。這樣看來，日本既出土年代可早自南宋時期的琮瓶，也有不少明代琮瓶傳世至今，桃山時期以來更製作不少原型來自中國II型和III型琮瓶的帶有拙趣的工藝品，可說是日本茶花界對於晚明文人蓄草瓶趣味的承襲和再創造。不僅如此，由於收錄有青瓷琮瓶的《古今和漢諸道具見知鈔》（元祿七年〔1694〕刊刻）等亦被收錄於做為庶民日用百科的《萬寶全書》當中（圖38），⁶⁰ 因此琮瓶也成了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器式之一。

55 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の陶磁》（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5），圖142。

56 德川美術館，《德川美術館藏品抄》4（名古屋：德川美術館，2000），圖135。

57 出光美術館，同註42，圖1100，以及滿岡忠成等，〈南海陶磁と日本〉，《世界陶磁全集》16・南海（東京：小學館，1984），頁238和頁298，圖324西田宏子的解說。另外，收藏單位雖將該琮瓶的年代定在15至16世紀，但我曾詢問熟習越南陶瓷史的森本朝子女士，她認為應是16至17世紀時期的作品。

58 京都國立博物館，《四百年忌 千利休展》（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0），頁225。

59 同註47，頁193-194，圖12的解說。

60 岡田宗叡，〈古今和漢諸道具見知鈔にみえるやきもの〉3，《陶說》，313（1979年4月），頁71。

五、宋代琮瓶原初功能的省思

相對於晚明文人是將南宋時期官窯系或龍泉窯系青瓷琮瓶做為廳堂花器和書齋中所謂茗草瓶來使用，然而在宋代，琮瓶是否亦屬花器？抑或另有其他功能？我對於此一攸關琮瓶出現契機的重要議題，迄今未有解決的方案。但想試著將焦點朝向琮瓶方身圓口、外方內圓的造型構思，並以此為線索對以往所知幾種具有共通造型的其他器類做一粗略的觀察。

其實，具備外方內圓琮瓶造型特徵的例子不少，時代較早的實例見於西安龍首原西漢早期墓出土的報告書所稱的「陶缸」（圖39）。⁶¹ 其均帶平頂蓋，各墓出土件數不一，其中保存完好的2號墓出土一件，但曾經盜擾的152號墓則出土了10件。從漢墓常見以模擬自現實世界的方形陶倉或圓形陶甗陪葬入壙看來，不排除此類呈外方內圓造型的帶蓋器亦屬明器穀倉？如西漢景帝陽陵出土的類似器形陶罐，即被定名為「陶倉」。⁶² 其次，江蘇江浦南宋慶元元年（1195）張同之墓，也出土了呈外方內圓造型的報告書所謂的「銅水盂」（圖40）。⁶³ 從所附器蓋一側開有缺口，露出銅匙柄，結合同墓共伴的石硯、墨錠和銅鎮紙、銅筆架等文房具，可以同意其應屬盛水研墨的水盂。就上引兩例器形和本文III型琮瓶相近的器物而言，前者漢代「陶缸」時代較早，看不出和宋代出現的琮瓶有任何關連；後者「水盂」尺寸較小，通高不足7公分，其和高近20公分的III型琮瓶所可能具備的功能，難以相提並論。

另一方面，宋元時期關隴地區墓葬則常見一式呈外方內圓造型，且尺寸大小亦和III型琮瓶大體相近帶蓋陶器，故其是否和約略同時期的琮瓶有關？有必要略作交待。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陝西西安、寶雞市（圖41）和興平縣等宋元時期墓葬均曾出土這類呈外方內圓造型，並添附龜形鈕蓋的陶器。⁶⁴ 陝西地區之外，類似造型的陶器還見於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⁶⁵ 其中，天曆二年（1329）汪懋昌墓既出土外方內圓式陶罐，還伴出了內方外圓式陶罐。由於兩者造型分別與

61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龍首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圖版10右下等。

62 漢陽陵考古陳列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19，圖201。

63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頁64，圖7。

64 盧桂蘭等，〈西安北郊紅廟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3期，封二，圖6；劉寶愛等，〈陝西寶雞元墓〉，《文物》，1992年2期，頁31圖6-7；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楊正興），〈陝西興平縣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2期，頁40，圖9。

65 甘肅省博物館等（喬今同），〈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一〉，《文物》，1982年2期，頁1-7；漳縣文化館（周之梅），〈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二〉，《文物》，1982年2期，頁13-21。

北宋聶崇義於建隆三年（962）獻呈太祖的《三禮圖》所圖繪的造型呈外方內圓的簠（圖42）、呈內方外圓的簋完全一致，且均帶龜形鈕蓋，所以我以前曾為文指出：宋元時期關隴地區墓葬出土的該類陶器乃是模倣自《三禮圖》系統簠、簋等禮器，其和洛陽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賽因赤答忽墓等墓葬所見模倣自《重修宣和博古圖》上的簠等陶禮器，形成有趣的對比。⁶⁶

在此應予留意的是，既然宋代琮瓶，特別是III型琮瓶的造型構思和聶崇義《三禮圖》所揭示的做為禮器的簠有共通之處，而被比定為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所在的杭州鳳凰山老虎洞窯和烏龜山郊壇官窯亦分別出土了III型和II型琮瓶（同圖12、13、18）。此一考古發掘資料，促使本文必須正視近年學者經常援引《中興禮書》的記載所指出：南宋官窯陶瓷祭器有的即是倣自《三禮圖》禮器之說法。⁶⁷換言之，雖然學界迄今未曾指出南宋官窯琮瓶與《三禮圖》的禮器有關，但因南宋官窯器式有的係來自《三禮圖》的禮器，因此本文確有義務針對此項議題進行論辯。

眾所周知，除了考古發掘之外，近年宋代官窯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恐怕要屬李民舉所率先使用的清人徐松輯、宋代禮部太常寺纂修的所謂《中興禮書》了。其中，有多處涉及南宋官窯依據《三禮圖》所載禮器燒造祭器的記載。如紹興元年（1131）造明堂祭器，即是依照《三禮圖》的禮器，紹興四年（1134）議者雖以徽宗所鑄新成禮器為合於古，卻因無《博古圖》，只好仍依據聶著舊圖。直到紹興十年（1140）製作「籩豆尊壘簠簋彝鼎諸器至今依三禮圖」，故簠和簋的造型是：「為桶立龜蓋上之類」。⁶⁸換言之，是以外方內圓的器身上置龜鈕蓋為禮器簠的造型。那麼，目前所見南宋官窯類型青瓷琮瓶雖未見帶蓋者，但其是否和《三禮圖》的簠有關？

相對於紹興十年為止，簠簋等均依聶著舊圖之制，但至紹興十五年（1145）情況已有所改善，如於同年十一月，「詔令段拂王鉄，一就討論同王晉錫製造。一、圓壇正配位尊壘並豆，並豆並係陶器，犧尊、象尊、壺尊各二十四，豆一百二十並蓋，簠簋各二十四幅，已上《博古圖》該載制度，於紹興十三年已行燒造

66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瓷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瓷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年夏季），頁150。

67 李民舉，〈宋官窯論稿〉，《文物》，1994年8期，頁51。

68（宋）禮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輯，《中興禮書》卷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8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6。

外，內有未應《博古圖》，今討論合行改造，太尊六十四，大疊二十四，已以《博古圖》（不？）該載，見依《三禮圖》燒造」。⁶⁹即以《博古圖》為準，不合制度的予以改造，只有《博古圖》未載錄者才依《三禮圖》燒造。從紹興十六年（1146）鑄造郊祀的簠，其「並蓋重一十三斤二兩，通蓋高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⁷⁰由於此一形制、尺寸與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所載簠完全一致（圖43），故可依據《釋奠儀圖》的圖繪與《博古圖》簠進行比對（圖44），進而可以確認紹興十六年新鑄的簠是屬於《博古圖》之制，⁷¹故其和呈外方內圓的《三禮圖》系簠的造型無關。

如果以上的引述無誤，那麼我們可以說，設若III型官窯琮瓶與《三禮圖》禮器簠有關，則其燒造時間應該要在紹興十三年（1143）之前，因為此後簠的造型已是依據《博古圖》所載錄的形制來製作的。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單純，因為我們只需確認發現有琮瓶標本的修內司窯和郊壇下窯等兩處南宋官窯之設置年代及其為朝廷燒製祭器的時間，疑難即可迎刃而解。

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十三年三月設稷壇，築圓丘，可知郊壇上限應晚於紹興十三年，故《坦齋筆衡》所說的「郊壇下別立新窯」之今日所謂郊壇下官窯為朝廷燒製祭器的年代不可早於紹興十三年。⁷²其次，依據《中興禮書》的記載，修內司官窯極有可能是在紹興十五年至紹興十六年（1145-1146）在內侍王晉錫的掌領下為官方祭祀燒製祭器的窯場，而此時祭祀用簠則已依《博古圖》製樣，至於紹興十三年之前做《三禮圖》禮器燒造祭器的窯場則限於浙江餘姚縣（紹興元年至紹興四年）和蘇州平江府（紹興十三年），而兩處窯場地點都不在出土有琮瓶標本的修內司窯和郊壇下窯窯址所在的杭州。因此，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外觀與《三禮圖》簠有相近之處的琮瓶，其實和簠無關。另外，傳世的幾件官窯類型III型琮瓶，其底足有圈足和平底之別，兩類底足作品年代是否相

69（宋）禮部太常寺纂修，前引《中興禮書》卷9，頁37-38。

70（宋）禮部太常寺纂修，前引《中興禮書》卷10，頁40。

71（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648冊史部406，頁19。另外，關於《釋奠儀圖》禮器形制的來源，陳芳妹認為是參酌《宣和博古圖》而來（陳，〈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的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頁14）；許雅惠則推測應來自以《博古圖》為母本的《紹興製造禮器圖》（許，〈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2003年），頁15。

72 米內山庸夫，〈南宋官窯の研究〉，《日本美術工藝》（1952年）；荒井幸雄，〈南宋官窯開窯時期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陶磁》1（1973-74年），頁51。

當？而其是否均來自被比定為修內司窯的老虎洞窯址所燒造？迄今不明。但可確認的是老虎洞窯址因出土有帶八思巴文印記的支釘具，故所出標本年代有的可晚至元代，⁷³ 故不排除Ⅲ式琮瓶有的即來自老虎洞元代瓷窯所生產。

那麼，目前所見官窯或龍泉窯系宋代青瓷琮瓶到底有何功能？本文雖無法對此做出解答，但想指出幾點應予留意的現象。即：（1）目前所知宋代三型琮瓶當中，以四川省江油縣北宋時期窖藏出土的Ⅰ型琮瓶年代最早。（2）所見宋代琮瓶除了陶瓷之外，亦見銅、石質者，而銅琮瓶和石琮瓶均只見於四川省窖藏出土品。（3）宋代陶瓷琮瓶見於浙江省龍泉窯、杭州老虎洞窯和郊壇下官窯等三處窯址，而除了窯址出土標本之外，龍泉窯琮瓶集中發現於四川省窖藏。其中遂寧窖藏兩件龍泉窯琮瓶是和一對石琮瓶共伴出土。（4）以兩件成組的方式埋藏入窖的例子還見於四川省廣安縣窖藏所見銅琮瓶，其和同窖伴出的銅淨瓶等作品之外表還髹漆。上述跡象在在顯示宋代琮瓶和四川地區的窖藏遺跡有關，而除了南宋兩處官窯琮瓶可能是提供都城臨安宮廷活動所需之外，龍泉青瓷琮瓶的主要消費市場也是在四川地區。

另一方面，就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而言，著名的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既曾發現當地製作的玉琮（圖45），⁷⁴ 而相對年代約於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更多達二十四件，是至今出土玉琮最多的商周時期遺址，出土地點限於Ⅰ區「梅苑」東北部的宗教祭祀區，⁷⁵ 所出玉琮既包括來自長渚文化的多節式長琮（圖46），⁷⁶ 也包括四川本地所製作的短方形琮（圖47）。⁷⁷ 這樣看來，四川地區居民很早就對玉琮有著深厚的興趣，考慮到1920年代、1930年代三星堆遺跡月亮灣曾陸續出土玉琮，⁷⁸ 故不排除四川宋代居民可能亦曾接觸零星的玉琮出土物。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宋代的四川居民視琮瓶為何物？但是，相對於北宋後

73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77，圖160；照那斯圖〈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窯具八思巴字譯釋〉，同前引《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15。

7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頁81，圖42之1，及頁533，彩圖18。

7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成都金沙遺址Ⅰ區“梅花”地點發掘一期簡報〉，頁4-65。

76 李學勤，〈論金沙長琮的符號〉，《四川文物》，2002年5期，頁15-1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遺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82-85。

77 朱章義等，〈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頁66-70。

78 1920年代出土品見：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1934), pp. 114-130, 此轉引自：楊建芳，〈早期蜀國玉雕初探——商代方國玉器研究之一〉，收入：趙殿增等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166，圖3之10。1930年代出土品見：陳德富等，《三星堆——長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41。

期中原地區禮家著述《續考古圖》時，以「制度未詳」一語帶過造型呈內圓外方的琮，四川江油縣北宋時期窖藏已經使用原型來自古代玉琮的封底銅琮瓶埋藏入窖，並和淨瓶、匱、鼎、爵等廣義的銅禮器共伴出土。如果說，四川地區宋代居民首先製作出琮瓶並賦予其某種功能意涵，因此爲了因應當地琮瓶的消費，而以成都平原亦曾出土的良渚類型多節式長琮爲模範，向浙江龍泉窯訂購青瓷琮瓶（II型），亦非不可思議之事。其次，老虎洞窯青瓷琮瓶（III型）之原型，既有可能來自良渚文化的短玉琮，也有可能是模倣自商周時期的矮方形琮。若屬後者，因浙江地區迄今未見商周時期矮方形玉琮出土例，故不排除見於三星堆、金沙遺跡的矮方形玉琮即杭州老虎洞窯青瓷琮瓶（III型）的原型。換言之，琮瓶有可能最早出現於四川地區，並經由其向外省訂購等途徑，漸趨推廣，最終成了各地競相倣效的瓶式。雖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四川境內商周時期的所謂祭祀坑和時代晚至宋代的所謂窖藏遺跡，兩者之間有任何的瓜葛？不過，我曾經籲請學界留意：四川省宋元時期窖藏遺跡，除了有以匿藏財物爲目的埋藏之外，另有部分窖藏之性質可能與當地的民間祭儀有關。⁷⁹ 就此而言，前述四川廣安縣窖藏以及江油縣彰明公社窖藏所出銅琮瓶因係和銅淨瓶共伴出土，而所謂淨瓶既是佛門用以淨潔的道具，南宋陸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也提到：「以淨瓶一枚坎地一尺二寸埋之」等道教科儀瘞埋之事，⁸⁰ 因此不排除宋代琮瓶可能亦具某種祭儀功能。就此而言，南宋官窯琮瓶也有可能和朝廷的祭祀活動有關。宋代以後，元代陶瓷琮瓶除了龍泉青瓷、景德鎮窯系青白瓷之外，要以江西吉安吉州窯的白瓷鐵繪琮瓶較爲常見，⁸¹ 也最具特色。其中，前引現藏City of Bristol Museum and Art Gallery的作品瓶身飾開光，並以水波紋爲地（同圖24），而前述可能具祭儀用途的遂寧市窖藏出土的一對青石琮瓶瓶身即陰刻波浪紋飾（同圖10）。⁸² 考慮到吉州窯窯址所在的江西吉安是元代廟學禮器的著名鑄造中心，包括雲南中慶路、河北彰德路等地廟學均派專人至吉安訂做禮器，⁸³ 所以也不排除吉州窯鐵繪琮瓶等

79 同註16，頁141-169。

80 （宋）陸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統道藏》卷11，頁2501。

81 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吉州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73。

82 《益州名畫錄》記載隨僖宗（在位873-888）由長安入蜀的孫位擅長畫水。蘇軾《畫水記》也提到此後四川地區畫家如黃荃、孫知微、蒲永昇等亦繼承此一畫水傳承而聞名，四川地區的畫水傳統與琮瓶上的水紋是否有關？有何象徵意涵？值得今後予以留意。另外，唐代畫水可參見：竹浪遠，〈唐代の海圖——その主題内容と繪畫史上の意義をめぐって〉，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紀要《古文化研究》，2（2003年），頁1-39。

83 劉岳申，《中齋集》卷6〈雲南中慶路儒學新製禮器記〉，此轉引自：蔡玫芬，〈轉型與啓發：淺論陶瓷所呈現的蒙元文化〉，收入：《大汗的世紀 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

作品或和當地的青銅禮器鑄造傳統有關？但此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來解決。

六、琮瓶的末裔

入清以後，琮瓶仍然流行不輟，但其功能更趨多樣，有的逐漸從晚明時期做為廳堂、書齋的插花或插置蓍草的廣義花器，趨向單純的擺飾。相對於晚明文人講求以官窯或龍泉窯等宋元時期青瓷琮瓶做為文房清玩，清初帝王則視琮瓶為漢人的古典風雅器式，命御窯廠燒進，此後以迄清亡，琮瓶成為清朝景德鎮歷代官窯必定燒進的瓶式，特別是在御窯廠督陶官唐英（1682-1756）的監理之下，琮瓶的裝飾屢有創意，而現存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亦有不少有關琮瓶的記載，提供我們考察釉彩變化豐富的景德鎮官窯傳世琮瓶的正確名稱或燒製年代時之重要參考資料。

從造辦處檔案結合現存傳世遺物看來，清代御窯廠似乎同時被賦予對琮瓶之倣古與創新等兩項任務。倣古方面，傳世幾件帶乾隆年款且有蟹爪紋開片的青瓷琮瓶，⁸⁴ 極有可能即乾隆三年（1738）太監高玉上交的「哥窯蓍草瓶」一類的製品。⁸⁵ 另從乾隆七年（1742）首領開其裏上交「龍泉釉蓍草瓶一件，隨座」，⁸⁶ 可以推測清初倣燒龍泉釉琮瓶，除曾參酌宋元龍泉琮瓶釉色，還曾考察其器身瘦長，需附插座以防傾倒的傳統用法。除了倣龍泉、哥釉之外，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收藏有乾隆官窯爐均釉琮瓶（圖48）。⁸⁷ 由於乾隆三年（1738）諭令太監高玉傳旨：「嗣後蓍草瓶不必燒造均釉」，⁸⁸ 可知此類乾隆御窯均釉琮瓶的燒造年代不晚於乾隆三年。

博物院，2001），頁232。另外，胡務亦曾援引《安陽縣金石錄》所收〈彰德路儒學創置雅樂重修講堂〉等來說明各地赴吉安訂製禮器的情況，參見：胡務，〈宋元明三代廟學的建築結構和祭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43期（2003年），頁170。

84 R. L. 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v, pl. 62 E356 (London: Bouverie House, 1926).

85 乾隆三年〈木作〉七月初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交大觀釉放大腰圓雙管瓶一件……哥窯蓍草瓶一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no. 75，頁527。

86 乾隆七年〈記事錄〉十二月二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首領開其裏交天盤口萬壽大罇一件（隨架座）……龍泉釉蓍草瓶一件（隨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卷no. 81，頁301。

87 中國陶瓷全集編集委員會，《中國陶瓷全集》15·清（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115。

88 乾隆三年〈江西〉十月二十九日「高玉傳旨：嗣後蓍草瓶不必燒造均釉，再釉裡紅龍梅瓶，紅龍顏色不好，往好裡燒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卷no. 76，頁276。

在創新方面，如乾隆七年（1742）司庫白世秀曾將唐英燒造的「洋彩著草玲瓏哥窯瓶一件」交太監高玉呈覽。⁸⁹ 對照現存實物，所謂「洋彩著草玲瓏哥窯瓶」，應該就是現藏中國北京故宮的瓶身鏤空、施罩青瓷開片釉，內裝粉彩花卉紫軋地轉心琮瓶（圖49）。⁹⁰ 其構思可謂巧妙，也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睞，故諭令將乾隆十二年唐英再次燒進的「哥窯玲瓏轉旋著草瓶二件」留在身邊，⁹¹ 與送交圓明園的同時燒進的其他陶瓷有所區別。除此之外，景德鎮御窯亦曾對琮瓶的瓶式進行改裝，如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雍正官窯青釉五孔方瓶（圖50），⁹² 其瓶式即是來自琮瓶。由於乾隆三年（1738）太監高玉曾上交一件「大觀釉五嶽花插」，⁹³ 而若據唐英成於雍正十三年（1735）《陶成記事碑記》提及曾仿內發宋器色澤的大觀釉等看來，所謂的大觀釉應該就是指清宮內府所藏之被判定為北宋徽宗官窯之包括月白、粉青、大綠等青瓷色釉，⁹⁴ 看來前引臺灣故宮藏青瓷五孔瓶，可能即是唐英所督造的「大觀釉五嶽花插」。此外，於釉彩等裝飾技法亦頗為豐富，除了青花、釉裏紅等釉下彩飾；亦見粉彩（圖51）、五彩、藍地描金等釉上彩飾；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乾隆官窯霽藍釉琮瓶則又於瓶身兩側貼塑象鼻（圖52）。⁹⁵ 景德鎮官窯之外，民間瓷窯場亦燒製不少琮瓶，其中又以廣東石灣窯（圖53）或福建德化窯製品較為常見，作品多是模製成形，故多於瓶身模印陽紋八卦爻文。由於民間瓷窯的任意性較高，故琮瓶的細部造型和裝飾內容也不一而足，既有於瓶身飾太極圖者，⁹⁶ 也有如光緒年間《點石齋畫報》

89 乾隆七年〈記事錄〉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將唐英燒造得青花白地雙喜耳罇八件……洋彩著草玲瓏哥窯瓶一件……交太監高玉等呈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卷no. 81，頁311。

90 馮先銘等，《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342，圖78。

91 乾隆十二年〈記事錄〉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將外隨大運上色錦上添花罇……哥窯玲瓏轉旋著草瓶二件……洋彩萬福洋花罇紋罇留下，其餘俱送往圓明園，交園內總管，欽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卷no. 87，頁397。

9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清康、雍、乾名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圖64，「雍正窯 粉青釉弦紋五孔方瓶」。

93 乾隆三年〈江西〉五月初六日「太監高玉交汝釉花觚一件……大觀釉五嶽花插一件……。傳旨：著將龍泉釉糖罇洗交與唐英照此釉水燒造……其餘八樣照樣燒造，顏色不惧……。欽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卷no. 76，頁263-264。

94 （清）唐英，《陶成記事碑記》，收入：張發穎等整理，《唐英集》（瀋陽市：遼寧書社，1991），頁950。

95 傳世的施以各種釉彩的清代琮瓶數量極多，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就典藏不少景德鎮官窯琮瓶。其中，光是施罩霽藍釉的琮瓶，包括乾隆（金-1912）、嘉慶（闕-432）、光緒（金-281-1）等各個時期作品（此承蒙臺灣故宮器物處余佩瑾科長的教示，謹致謝意）。另外，若以近年刊行的《中國陶瓷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清代卷為例，當中收錄有：雍正窯「天藍釉環耳方瓶」（上卷，圖208）、乾隆窯「霽藍釉描金方形蓋罇」（下卷，圖91）、乾隆窯「爐鈞釉琮式瓶」（下卷，圖115）、光緒窯「藍釉描金琮式瓶」（下卷：圖217）等景德鎮官窯製品。

96 R. L. Hobson, 同前引書，pl. 75 E463。

所見恭親奕訢別墅圖，置於炕几上之瓶插置花卉的四方瓶（圖54），⁹⁷ 從其瓶身飾八卦等看來應屬琮瓶類，但口沿已由短頸圓口改變成長頸方口了。同樣有趣的是，晚迄清末，琮瓶甚至做為外銷瓷的瓶式之一販售到其他國家，如1822年（道光二年）自中國廈門出港航向印尼巴達維亞而不幸失事沉沒的「的慳號」（Tek Sing）沈船即發現有白釉小琮瓶。⁹⁸

另一方面，日本自室町時代十六世紀即以琮瓶做為茶花道的花器，而從前引天文二十三年（1554）《立花圖卷》等花傳書所見圖像資料（同圖30），以及茶會記《松屋會記》天正五年（1577）記載以「青地經筒」即青瓷琮瓶插置水仙花等文獻資料看來，⁹⁹ 琮瓶於日本應是實用的花器，而少有插置茗草之例。由於琮瓶又被載入《萬寶全書》等日用百科書，因而又成了家喻戶曉的插花器，十九世紀的薩摩燒甚至燒造紋樣繁縟的釉上彩繪、描金琮瓶外銷到歐洲。¹⁰⁰ 但應留意的是，由於日本因經常使用古物做為茶花道席上的道具，因此除見以龍泉窯類型琮瓶為花器，亦見將聶崇義《三禮圖》系統的簠轉用於花器之例，如現藏根津美術館的「古銅四方花入」（圖55），¹⁰¹ 其內圓外方的造型雖和所謂琮瓶有共通之處，但從瓶身下置方形足，瓶口無頸等細部特徵看來，我認為其應屬禮器簠。這從日本安永五年（1776）陸奧守伊達重村獻呈湯島聖堂釋奠器中的泥金漆簠之造型特徵（圖56），¹⁰² 亦可得到證實。

97 轉引自：朱家潛，《明清室內陳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圖147。

98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000. p.95; David Freedaman,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2000).

99 轉引自：西田宏子，〈花生としての古銅と青磁の器〉，收入：德川美術館等編，《花生》（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1982），頁138。

100 Christie's, *Asian Decorative Arts* (London: South Kensington, September 2003). pl. 292.

101 德川美術館等，同前引《花生》，圖76。

102 文部省御藏版，《日本教育史資料》，7（東京：富山房，1892初版，1904再版），〈祭儀〉，頁29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于魯，《方氏墨譜》，北京：中國書店，1990。
- 王圻等，《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史部四〇六，648冊。
- 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七十九，醫家類，773冊。
-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臺北：世界書局，1974。
- 袁宏道，《瓶史》，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藝術叢編《觀賞別錄》，臺北：世界書局，1969。
- 唐英，《陶成記事碑記》，收入：張發穎等整理，《唐英集》，瀋陽市：遼寧書社，1991。
- 高濂，《遵生八牋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程大約，《程氏墨苑》（萬曆間程氏滋蘭堂刻彩色套印本），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陸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統道藏》，卷11。
- 陳祥道，《禮書》，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五，130冊。
- 張謙德，《瓶花譜》，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藝術叢編《觀賞別錄》，臺北：世界書局，1969。
- 趙九成，《續考古圖》，收入：《考古圖 續考古圖 考古圖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劉禹錫，《劉賓客文集》，收入：《四庫全書》本，集部，別集類，1077冊。
- 劉績，《三禮圖》，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四，129冊。
- 禮部太常寺纂修，《中興禮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8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

《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10·工藝美術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中國國家博物館等

《吉州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

中國陶瓷全集編集委員會

《中國陶瓷全集》15·清（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王巍

〈良渚文化玉琮芻議〉，《考古》，1986年11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甘肅省博物館等（喬今同）

〈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一〉，《文物》1982年2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

〈成都金沙遺址1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4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遺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朱伯謙

《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

朱家潛

《明清室內陳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朱章義等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

江油縣文物保護管理所（黃石林）

〈四川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西安龍首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李民舉

〈宋官窯論稿〉，《文物》1994年8期。

李明高

〈廣安縣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1期。

李學勤

〈論金沙長琮的符號〉，《四川文物》，2002年5期。

杜正賢

〈老虎洞窯址——揭開修內司官窯與哥窯瓷的千年面紗〉，《文物天地》2005年5期。

《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

林麗江

〈徽州版畫《環翠堂園景圖》之研究〉，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南京市博物館

〈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

洛陽文物工作隊

〈洛陽西郊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9，1985年。

胡務

〈宋元明三代廟學的建築結構與祭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2，總第43期，2003年。

夏鼐

〈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原載：《文物》，1983年5期，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鼐文集》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浙江省博物館編

《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秦大樹

〈老虎洞官窯性質芻論〉，《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楊正興）

〈陝西興平縣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2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

《唐惠昭太子陵發掘簡報》，陝西：三秦出版社，1992。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

《清康、雍、乾名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常德市博物館（徐小林）

〈常德黃土山宋墓〉，《湖南考古》下，2002年。

曹礎基

〈八卦的“祕密”〉，《古代禮制風俗漫談》3，北京：中華書局，1992。

許雅惠

〈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2003年。

郭葆昌等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錄》，北京：鱗齋書社，1931。

陳芳妹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的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收入：《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2005。

陳德富等

《三星堆——長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馮先銘

《宋元青白磁》中國陶瓷全集16，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4。

馮先銘

《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黃石林

〈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2期。

楊建芳

〈早期蜀國玉雕初探——商代方國玉器研究之一〉，收入：趙殿增等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3。

照那斯圖

〈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窯具八思巴字譯釋〉，《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遂寧市博物館等（莊文彬）

〈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

廖文偉編

《古董拍賣集成·色釉瓷》，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漳縣文化館（周之梅）

〈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二〉，《文物》，1982年2期。

漢陽陵考古陳列館

《漢陽陵考古陳列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劉寶愛

〈陝西寶雞元墓〉，《文物》，1992年2期。

蔡玫芬

〈轉型與啓發：淺論陶瓷所呈現的蒙元文化〉，收入：《大汗的世紀 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鄭振鐸

《中國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鄧淑蘋

〈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故宮學術季刊》6卷2期，1988年冬季。

盧桂蘭等

〈西安北郊紅廟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3期。

謝明良

〈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瓷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瓷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年夏季。

〈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山根有三

〈室町時代の立花圖卷について—花道史序説—〉，《大和文華》14，1954年。

文化公報部

《新安海底遺物》，서울特別市：文化公報部等，1985。

文部省御藏版

《日本教育資料》7，東京：富山房，1892。

出光美術館編

《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

吉田光邦

《工藝と文明》，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5。

竹浪遠

〈唐代の海圖—その主題内容と繪畫史上の意義をめぐって〉，黒川古文化研究所紀要《古文化研究》2，2003年。

米内山庸夫

〈南宋官窯の研究〉，《日本美術工藝》，1952年。

西田宏子

〈花生としての古銅と青磁の器〉，收入：徳川美術館等編，《花生》，名古屋：徳川美術館等，1982。

京都國立博物館

《四百年忌の千利休展》，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0。

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本の陶磁》，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5。

林巳奈夫

〈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報》60（京都：1988），後收入：同氏，《中國古玉 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

〈中國古代の祭玉・瑞玉〉，原載：《東方學報》40（京都，1969），後收入：同氏，《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

林屋晴三等編

《東洋陶磁》1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2。

座右寶刊行會編

《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7。

神戸市立博物館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神戸：神戸市立博物館，1982。

荒井幸雄

〈南宋官窯開窯時期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陶磁》1，1973-74年。

細川護貞等

《いけばな》，《別冊太陽》12，東京：平凡社，1975。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

《遺跡にみる戰國・桃山の茶道具》，愛知縣：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7。

滿岡忠成

〈南海陶磁と日本〉，《世界陶磁全集》16・南海，東京：小學館，1984。

福島縣立博物館

《戰國の城——天守閣への道》，福島：福島縣立博物館，1998。

徳川美術館

《花生》，名古屋：徳川美術館等，1982。

《徳川美術館藏品抄》4，名古屋：徳川美術館，2000。

Christie's

The Imperial Sale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Hong Kong, April, 28, 2003.

Asian Decorative Arts, South Kensington, London. September 4, 2003.

Graham, David C.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34.

Donnelly, P. J.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Hobson, R. L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V, London: Bouverie House, 1926.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1999.

Kerr, Rose

“Metalwork and Song Design: A Bronze Vase inscribed in 1173”, *Oriental Art*, vol. XXXII, 1986.

Little, Stephen

“Shunzhi Ceramics 1644-61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Oriental Art*, vol. III,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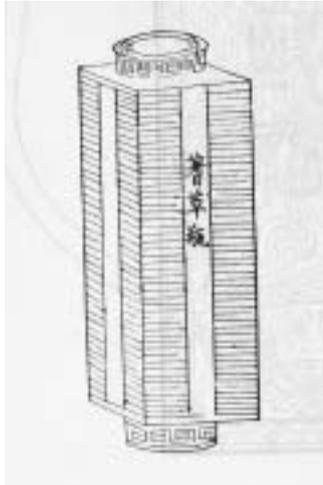


圖1 明代《方氏墨譜》所載「著草瓶」自銘墨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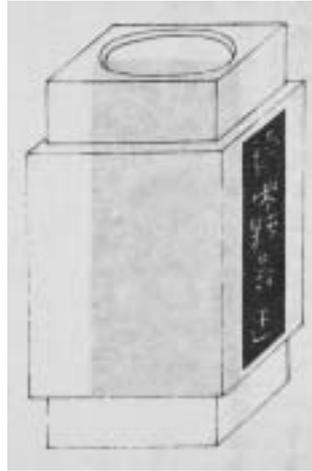


圖3 《續考古圖》所載「制度未詳」柱形器



圖4 鐫刻乾隆御製詩文的玉琮
明末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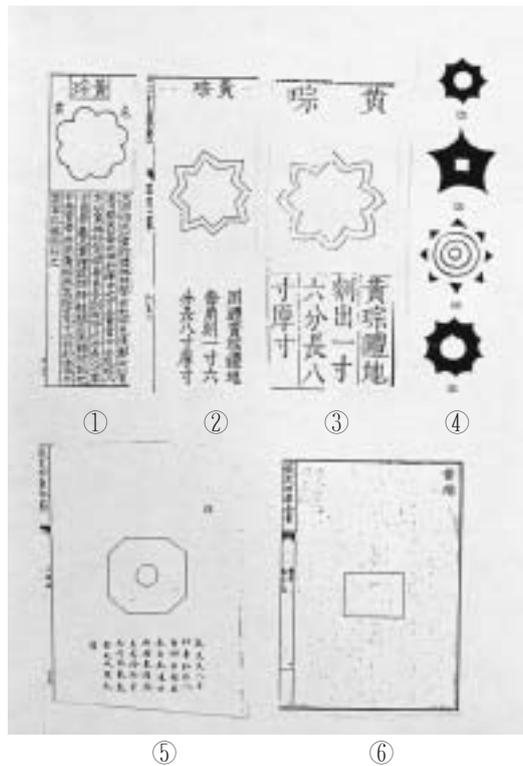


圖2 禮書所載黃琮造型

- ① (宋)《新定三禮圖》
- ② (明)《三才圖繪》
- ③ (明)《六經圖》
- ④ (宋)《隸釋》所載漢碑碑陰
- ⑤ (明)《三禮圖》
- ⑥ (宋)《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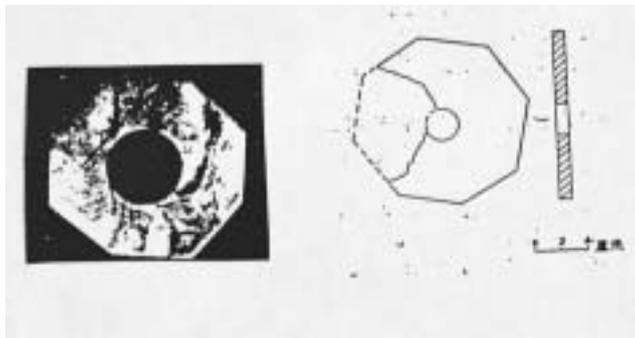


圖5 唐代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玉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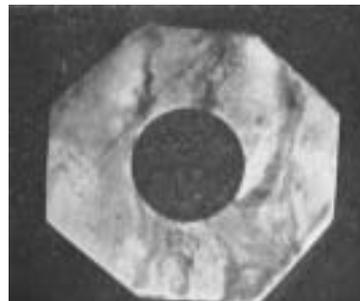


圖6 洛陽戰國墓出土的「八角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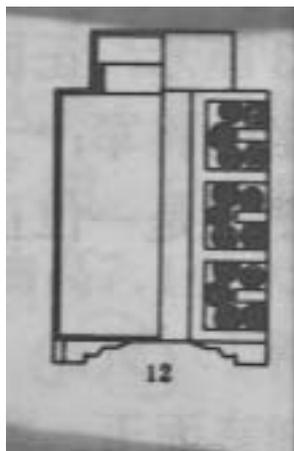


圖7 四川江油縣宋代窖藏出土的「銅方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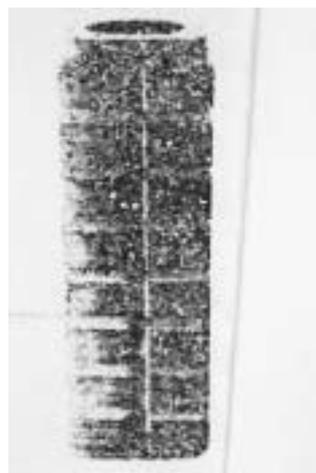


圖8 四川廣安縣宋代窖藏出土髹漆銅琮瓶 (IIa式)



圖9a 四川彭州市博物館藏銅琮瓶 (IIb式)
張維珊拍攝



圖9b 同左局部



圖10 四川遂寧窖藏出土的石琮瓶（IIb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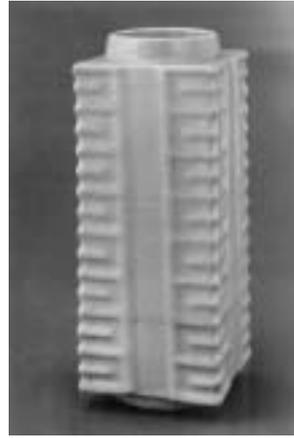


圖11 南宋龍泉窯青瓷琮瓶（IIb式）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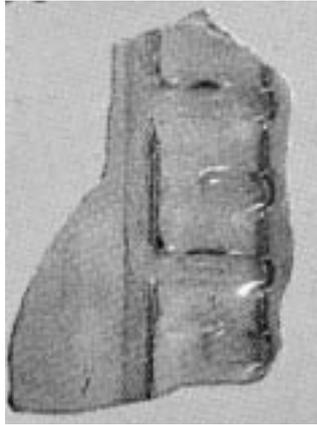


圖12 米內山庸夫於南宋郊
壇官窯址採集得到的青瓷琮瓶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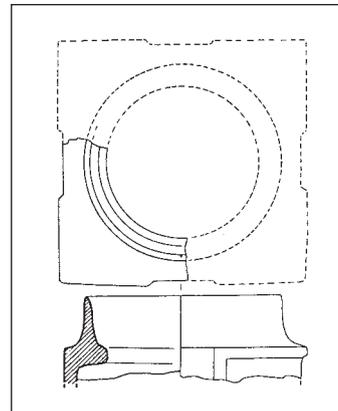


圖13 南宋郊壇官窯窯址出
土的青瓷琮瓶線繪圖



圖14a 青瓷琮瓶（III a式）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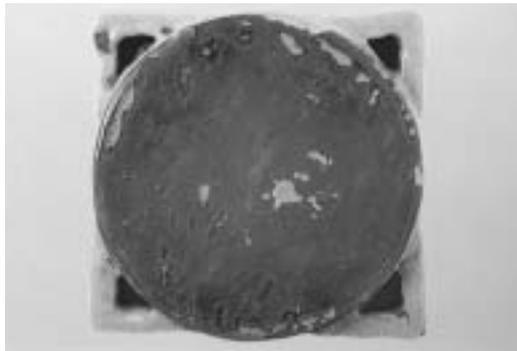


圖14b 同左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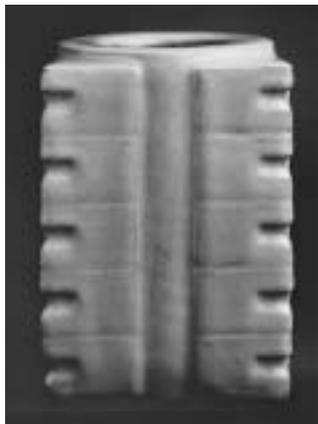


圖15a 青瓷琮瓶 (III a式)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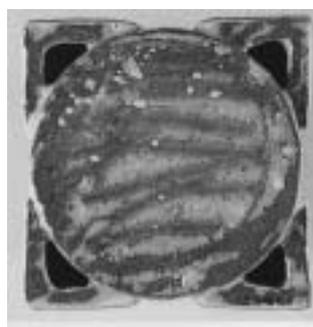


圖15b 同左底部



圖16a 青瓷琮瓶 (III b式)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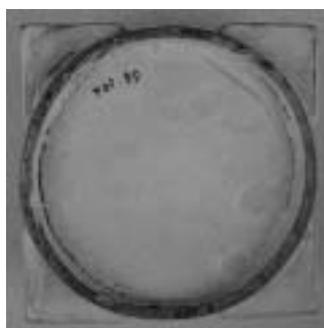


圖16b 同左底部



圖17a 青瓷琮瓶 (III b式)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7b 同左底部



圖18 杭州老虎洞窯窯址出土 青瓷琮瓶 (IIIb式)



圖19 明代《列仙全傳》所見琮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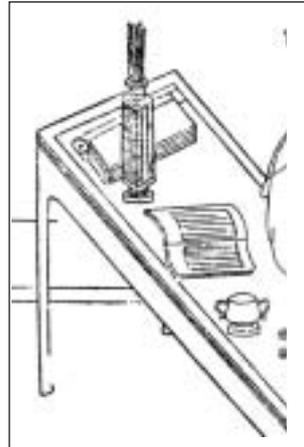


圖20 明代《列仙全傳》所見琮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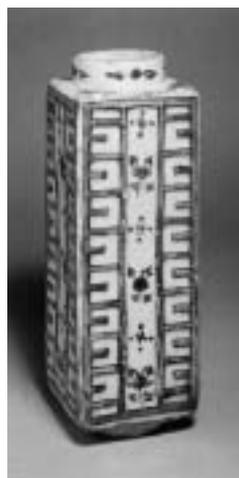


圖21 明末景德鎮窯青花琮瓶
Asia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圖22 龍泉窯青瓷帶座琮瓶
正德十三年(1518)墓出土



圖23 元代青白釉琮瓶
四川重慶市博物館藏



圖24 元代吉州窯鐵繪琮瓶
Bristol Museum and Art Gallery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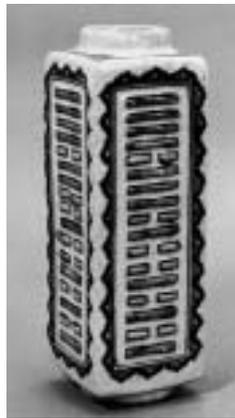


圖25 明末釉上加彩琮瓶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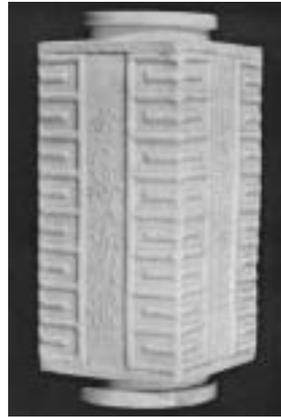


圖26 明代德化窯白瓷琮瓶
Kempe Collection



圖27 ① 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見蒼草
②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所見蒼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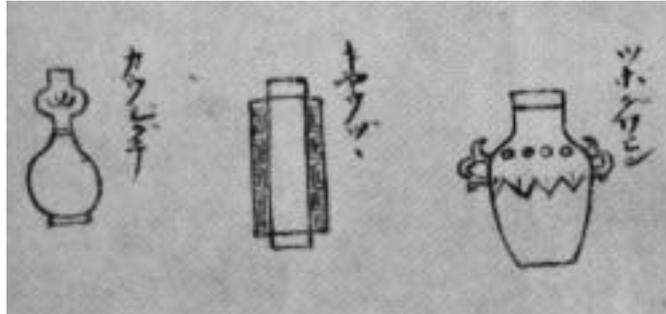


圖28 日本 慶長二年（1597）池坊專好《花傳書》所見琮瓶



圖30 日本 天文二十三年（1554）
《立花圖卷》所見琮瓶



圖29 日本 天文五年（1536）
《唯心軒花傳書》所見琮瓶



圖31 《雅遊漫錄》中的理想書齋



圖32 元代龍泉窯青瓷琮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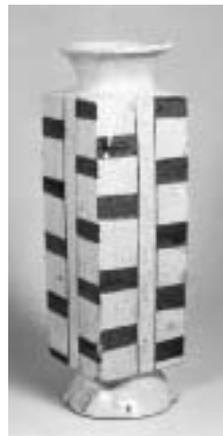


圖33 日本織部燒 16世紀
末至17世紀前期 梅澤紀念館藏



圖34 日本丹波燒 17世紀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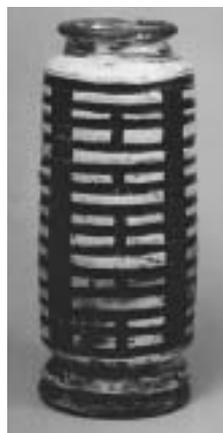


圖35 朝鮮王朝八卦紋瓶
16至17世紀



圖36 越南青花狩獵紋瓶
16至17世紀 出光美術館藏



圖37 與次郎作鐵茶釜
16世紀 官休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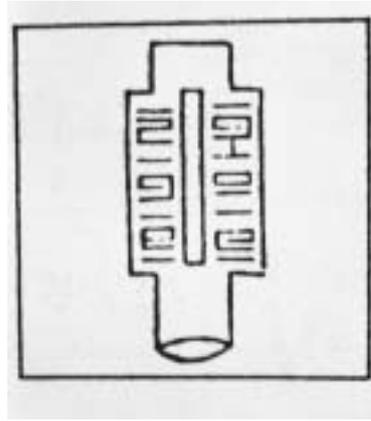


圖38 《古今和漢諸道具見
知鈔》(1694年刊)所見琮瓶



圖39 西安龍首原漢墓(M11)
出土陶缸



圖40 江蘇南宋張同之墓
(1195)出土銅水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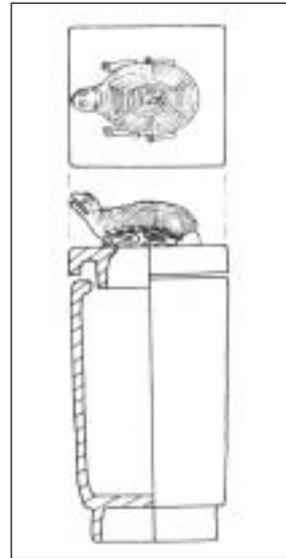


圖41 陝西寶雞市元代
墓出土的陶簠



圖42 聶崇義《三禮圖》的禮器簠



圖43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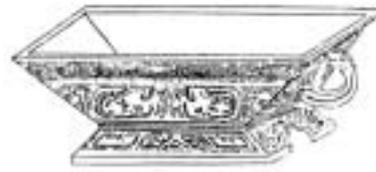


圖44 《宣和博古圖》的簠



圖45 廣漢三星堆一號坑出土玉琮



圖46 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出土玉琮



圖47 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出土玉琮



圖48 乾隆官窯爐均釉琮瓶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9 外哥釉內粉彩花卉紫
軋地轉心琮瓶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0 雍正官窯粉青五孔方瓶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1 乾隆官窯粉彩琮瓶
Baur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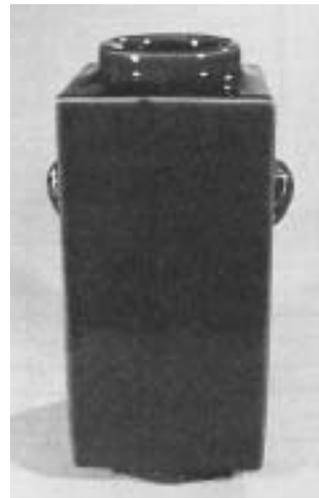


圖52 乾隆官窯霽藍釉琮瓶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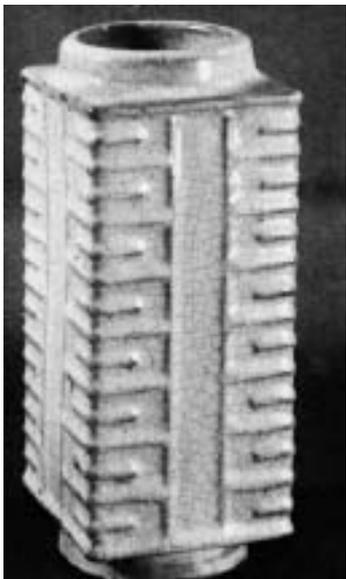


圖53 明代石灣窯琮瓶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4 《點石齋畫報》所見恭親王奕訢別墅圖



圖55 銅簠 根津美術館藏



圖56 湯島聖堂藏泥金漆簠 (1776)